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华古政治史论集

王曾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华古政治史论集

王曾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政治史论集 / 王曾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2023 - 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文集 IV. ①D6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6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

——以宋代为中心 (1)

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 (15)

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28)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35)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 (71)

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 (77)

宋朝卖官述略 (97)

辽金元卖官述略 (142)

忧国忧民启深思

——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159)

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163)

“清官”考辨 (165)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180)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

——以宋朝的士大夫为中心 (213)

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 (232)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中国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248)

北宋晚期政治简论

——从腐败走向灭亡 (251)

秦桧独相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
——兼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 (261)

王曾瑜说辽宋夏金总说 (310)

附录 (335)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

——以宋代为中心

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无疑要比古人丰富得多。20 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但与先进民族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归纳起来，无非是全盘继承、全盘摒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摒弃，至于如何选择，又各有看法。

研究中华古史的人，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其实是矛盾的，有时觉得可爱，有时又觉得可憎。

回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无产阶级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彻底决裂，单纯从口号上看，似乎非常革命。但在经历了十分惨重的全民族劫难之余，人们终于醒悟到，那次劫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中华古代坏传统的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和发扬光大而已，不过是以最革命的旗号，复辟着最反动的传统。

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笔者终于醒悟到，“从坏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是一对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①“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②所谓愚昧，可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历史证明，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绝对愚蠢的事。

① 《城狐社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4 页。

② 《荒淫无道宋高宗》序，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但是，在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摒弃传统的议论，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又舍不得完全割弃传统，而是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五四运动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①

近日阅读《怀念李慎之》一书，此书第173页谈到，李慎之先生“炽爱中国，所以他对拖住中国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客观需要，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甩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②但中华传统文化能否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只怕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作进一步思考，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差别。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灿烂古文明，也有其缺点，否则就不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属文化传统，却不一定必须与专

^①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②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凝意斋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制主义挂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批判的。

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箴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于专制、愚昧和腐败，却在中华古史中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论述和批判，今列举如下。

一、草菅人命：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①。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明太祖光是胡惟庸、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从秦代的“夷三族”扩展到七族，隋炀帝又扩展到“诛九族”。^② 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死活，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被视为天经地义。如此之类，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性。草菅人命是中华专制政治最可怖、最可憎的罪恶。

宋政似乎有“宽仁为治”的外貌，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③ 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史称宋徽宗时，“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寢深”。宋理宗时，官吏们“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私设“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毒刑，受刑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414页。

② 王春瑜：《“株连九族”考》，《“土地庙”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③ 《宋史》卷199《刑法志》；另参见《文献通考》卷167载宋孝宗乾道五年臣僚言。

“痛深骨髓，几于殒命”。^① 宋徽宗在位晚年，“御楼观灯”，“众中忽有人跃出”，“出指斥语”。宋徽宗“怒甚，令中使传旨治之。箠掠乱下，又加炮烙”，“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② 这是皇帝亲自施加的法外惨毒酷刑，又有何“宽仁”可言。宋朝出了如岳飞“莫须有”（岂不须有）那样的千古奇冤，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还是将岳雲定为徒刑，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罚铜二十斤，“每斤一百二十文足”，^③ 共计两贯四百文。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将岳雲超越流刑，定为斩刑，也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的兽性。

中国人也并非不强调“人命关天”，^④ 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但在古代不居主导地位。人命最为可贵，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国际上已制订了一个公认的反人类罪标准，而专制政体大致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为其首要的最大罪状。这在根本上还是源于贱视人命。

二、禁锢思想言论：是舆论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控舆论，是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野之一。从中国古史上看，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将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从此实现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四是明朝在科举中采用八股文；五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

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又有利诱的一面。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旦将教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其实是更厉害的禁锢，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胡适曾惊讶于当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展于古书堆时，西方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于自然科学。这无疑是宋明清三代禁锢思想言论的可悲结局。直到鸦片战争前，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

① 《宋史》卷200《刑法志》。

② 《宋史》卷65《五行志》。

③ 《庆元条法事类》卷76《罚贖》。

④ 元杂剧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第四折：“从来人命关天关地。”王仲文《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第三折：“人命事关天关地。”

问，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

三、上交谄，下交渎：《周易·系辞下》强调“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必然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只问品级，不论是非，上交谄，下交渎，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今人所谓个人崇拜，其实不是崇拜个人，而是崇拜权势，渴望权势。《聊斋志异》卷8《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一语道破了阿谀奉承的真谛。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在天水一朝的诸帝中无疑位居第一。当时也有言官批评他“金柱玉户”，但蔡京却作记说，宋徽宗“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言者不根，盖不足恤”。^①在蔡京所谓“陛下当享天下之奉”的诱导下，众臣“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②更有甚者，宋高宗向杀父之仇称臣，屈辱苟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竟在一片歌颂声中，被臣僚誉为“书契以来，中兴复古之君，比德较功，莫有望其仿佛者”，“皇帝躬行，过于尧、禹”。^③薛昂“始终附会蔡京”，故两次被援引，当仅次于宰相的执政，“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④身为执政高官，居然为宰相避名讳，以至自己打自己嘴巴。

四、虚饰太平盛世：隋炀帝自夸“华盛”，规定洛阳“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⑤

宋高宗和秦桧“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⑥由于古代有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将灾情、疫情等都视为人间失政的反映和表现，

① 《挥麈录余话》卷1。

② 《宋史》卷472《蔡京传》。

③ 《紫微集》卷1《绍兴中兴上复古诗》。

④ 《宋史》卷352《薛昂传》；《说郛》弓37《闲燕常谈》。

⑤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六年。

⑥ 《宋史》卷65《五行志》。

故秦桧隐瞒灾情、疫情等。“严、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者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①宋时官员隐瞒灾情是有罪的，秦桧不仅知法犯法，反而加罪于说真话者。绍兴十六年“行都疫”，而秦桧的尚书省只是上奏建议“给散夏药”，根本不承认发生了瘟疫。^②虚饰太平盛世而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以至不惜劳民伤财，官府为刀俎，百姓为鱼肉，成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顽症。皇帝欺瞒胡人，宰相欺瞒皇帝，官员自然也可以欺瞒上司。《朱子语类》卷106谈及地方官，“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这是欺瞒上司的一例。

五、贪污行贿：此类行为史不绝书。应当指出，在专制的人治条件下，一是败露率低，二是败露也未必依法惩处，故贪污行贿必然是低风险，高收益，而敢于触犯刑法者众。皇帝、权臣等经常是此类行为的保护伞。人们公认宋初以重典惩治贪官。^③但是，大将王全斌等平后蜀，恣为不法，“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百官表言”王全斌等“法当死”，而宋太祖“特赦之”。后来宋太祖又给王全斌复官节度使，说：“抑卿数年，为朕立法。”^④宋高宗时，黄达如“赃污钜万”，而被按劾。但他利用“太后还銮”的机遇上奏，建议将“盛事”“作为歌诗，荐之郊庙”，“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于是宋高宗大悦，居然发表他出任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监察御史。后来在官员的论列下，也仅以“私役禁军，贩易物货”的次要罪名，“降一官，放罢”。他在秦桧死后，还出任徽州知州。^⑤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又恣意玩侮法律，这也是一条中华自古相传的政治老例。

六、妒贤嫉能：北宋末，国势阽危，唯有李纲尚能挺身救国，而耿南

① 《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宋会要》食货59之31。

③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壬子、癸丑；《宋史》卷255《王全斌传》，两处记载的贪污数字不同，但无疑都是巨额贪污。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十二月己巳，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戊辰，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乙卯。

仲伙同徐处仁、唐恪等人，“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一力怂恿宋钦宗命李纲承担无法胜任的救太原的重任，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①这又是一种中华自古相传的“窝里斗”，“窝里横”的政治传统。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妒贤嫉能的极致当然就是陷害忠良。

七、结党营私：中国成语“结党营私”，确有科学内涵，大凡钻营官场而谋私者，往往必须结党，不结党就无法营私。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的极致，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古代皇帝往往十分忌讳臣僚分朋植党，所以结党营私一般是无法公开的。但是，在南宋四个权臣掌政的时代，他们又是并无忌讳地、大规模地任用亲党。史弥远深通擅权的三昧，他“专任俭壬”，而手段却更加隐蔽和狡猾。“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②“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都是宋时的要员，“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附会者进”，对他“争为妾妇之道”。所以柴中行评论史弥远的结党营私的特点，是“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③在民主体制下，任何政客失去民望，只能下野。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多见不怪的怪现象，不管某人如何丧失民望，甚至万众切齿，只要“上台喜”，即通过各种政治关系网的保护，就能长久官运亨通，骑在人民头上擅作威福，恣为不法。相反，真是得人心的好官反而不得势，甚至惨遭陷害。中国人常哀叹君子斗不过小人。“纵观中华数千年史，其实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还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而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一批小丑主宰国运，一方面是自己演出丑剧和闹剧，另一方面则是给广大民众制造悲剧。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有其历史必然

① 《会编》卷66《靖康小录》。

②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③ 《宋史》卷401《柴中行传》。

性。”“专制政治总是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专制政治体制经常会造就小丑神气活现的时势，而小丑也经常会对昏暗腐败政治推波助澜，甚至叱咤风云。”^①

八、勾心斗角：在中国传统官场中，勾心斗角和结党营私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有时必须互相勾结和利用，有时又必须互相倾轧和暗算。宋真宗时的王钦若“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② 人们所熟知的，就是成语中孤注一掷的出典。他在澶渊之盟后排挤寇準，对宋真宗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③ 于是寇準罢相。当然，由于宋太祖传下了不杀大臣的誓约，故在个人或派系的倾轧中，杀人不多。这是宋朝有别于前朝后代的特点。一般说来，设法将政敌流放到海南岛，就算是倾陷的终点。勾心斗角的极端，当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人莫予毒。

九、官迷恋栈，恃宠保禄，因循苟且：《聊斋志异》卷3《夜叉国》说：“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养尊处优的地位，荣华富贵的待遇，必然造就大批的官迷。《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干宝《晋书》：“弩马恋栈豆。”原意为没有远虑，后世则转为贪恋禄位之意。这是古时常把官迷喻之为恋栈的出典。宋神宗时，邓綰就是个典型的官迷，他有一句名言：“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④ 蔡京四次拜相，“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⑤ 甚至到“老疾目失明，文书案牍不能省阅”时，^⑥ 依然贪恋相位。最后宋徽宗命童贯和其长子蔡攸向蔡京索取辞官表，蔡京“以事出不意，一时失措，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其

① 《秦桧独相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凝意斋集》第281页，此文也搜入本书。

② 《涑水记闻》卷7。

③ 《宋史》卷281《寇準传》。关于王钦若的工于倾陷，参见王瑞来《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第六章第二节“诡计于人中伤”，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272页。

④ 《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癸亥；《宋史》卷329《邓綰传》。

⑤ 《宋史》卷472《蔡京传》。

⑥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

子为‘公’，莫不窃笑”。^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的，官位既然成为高收益的肥缺，并且又能够以权谋私，官迷现象就不免世代相传，而不能根除。官迷的一大特点，就是恃宠保禄，“因循苟且”。^②决不求有棱角，决不敢露锋芒，决不能惹是非，决不做利国益民而影响前程的事，唯上，唯官，唯利，一大批又一大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场混混儿，总是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十、玩忽职守：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玩忽职守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北宋末年的李擢就是一个典型。当金军攻打开封城时，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城墙四壁的提举官，“东壁孙觐，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李擢是中书舍人。^③开封城外有护龙河，又有“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④本来是不易被攻破的。金军攻城之初，就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于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谑笑，或日醒醉。守御使孙傅、王宗濬，宰相何桌皆知而不问，将士莫不扼腕者”。南城偏东的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一带，“已填了三分之二，长一里许”。宋钦宗登南城才发现“城濠填垒殆尽”，大怒，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⑤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对于这个严重玩忽职守者，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远窜”。南宋初，李擢受邓肃和马伸的弹劾，说他与王时雍等“七人者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之说，助成敌谋。有不主和议者，群起而辱骂之，欲执送金营”，又受张邦昌伪命，“为侍从者”。^⑥李纲任相时，将李擢处以郴州安置。^⑦但黄潜善和汪伯彦当政后，又将他“进

① 《清波别志》卷中。《宋史》卷472《蔡京传》所载稍异，说只是童贯一人向蔡京索取辞官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数年，当有相谗谮者。’贯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贯，帝命词臣代为作三表请去”。

② 《王文公文集》卷1《上时政书》。

③ 《会编》卷64、卷65。《靖康要录》卷12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所载四壁提举官名单有异。

④ 《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⑤ 《会编》卷66、卷67、卷68。

⑥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卷16建炎二年七月丁酉。

⑦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癸亥。